

二十世纪 古史研究反思录

常金仓◎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常金仓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0

ISBN 7-5004-5235-7

I. 二… II. 常… III. 古代史—研究—世界—二十世纪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718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2

字 数 281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常金仓，1948年生，山西省原平市人。1982年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专业本科毕业，留校任教。1986年考入吉林大学师从金景芳教授学习，1989年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此后在高校从事中国先秦史、中国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现任教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近年来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
中国史学的科学化问题上，本书收集的论文即是在这方面思考的部分成果。除此书外，还出版过著作三部，发表论文60余篇。

此60余
文之误解。《老子》十七章说：“

论然。——如果无所事事，怎么能功

《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解释了天

三部·道应训》引《老子》四十八

作而释之曰：“所谓无为者，不先物

因物之所为。』
《韩非子·解

版
人
国
若
烹
小
鲜
』
曰
：
「
事
大
众
而

出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

它们说明战国秦汉间学

吕绍纲先生序

常金仓教授与我有十七年的学术交往历程，我充分了解他的史学思想，我愿意为他的论文集做评审推荐。

常金仓先生为自己选择了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那就是在对当代史学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基础上探索新世纪史学的发展方向。他以区区私家之力，面对强大的习惯势力，引导人们接受一种新的历史思维，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心。据我所知，这个意义重大的课题一开始就碰了钉子，作者曾连续两年以“自选课题”为本书申请过国家和教育部社会科学的年度项目，然而均未获准立项，我虽然不知道这些项目的评审过程，但根据他的资质、他的前期成果，他的课题的意义远胜某些已经立项的课题，当读者打开本书时就会发现，作者在指出 20 世纪历史研究中种种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思想行为的同时，也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独特的新史学理论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他的思想与传统史学的区别。

一、本书为中国历史学确立了新的使命。常金仓先生认为在中国史学史曾先后为历史学确立过两种使命，第一种是做政治家的助手，第二种是修补残破的历史，“复原”历史面貌。他用大量前人研究的事例论证了这两种史学职能在当前已丧失了效用，而且它们自身也是缺乏科学性的。他指出研究历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正确认识自己的文化，因为人一生下来就落在一个前人

已经编织好的文化之网中，这张文化网既给社会建立了秩序，也给社会带来了痛苦，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弄清楚那张他自己置身其中的文化之网的构造，以便人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创造自己的文化。他在《论现象史学》一文中说，服从于旧史学使命的历史研究在表现形式上都是以事件为单元的叙事史，他坚信，无论你把故事的细节考证得多么逼真，无论你把事件的原因结果说得如何头头是道，永远从历史上找不出科学道理来，他建议我们把历史研究的重心从关注事件转移到观察分析历史和文化现象上来。他的思想在历史研究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跳跃，这一跳跃也许会使丧失人们欢心的历史学更加贴近人们的需要。

二、本书在科学思想和形而上学之间划出了一道明确的界线。对不可记数的历史事实加以归纳概括，从历史事实的背后寻找社会意义，是西学东渐以后中国史学上出现的新现象。经过一个世纪的史学研究实践，他发现被我们接受的那些西方理论大多是在它们本土已过时了的形而上学学说，根本配不上科学的称号，这种学说总是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总是构建世界文化的统一模式，而无视世界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本书作者在《历史分期讨论与发现真理的两种方法》一文中仔细区分了科学概括与形而上学理论在思想方法上的不同，并在多篇专题讨论中力排形而上学思想，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这个问题在欧美历史学中虽然已是家喻户晓，但在我国史学界仍然是个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解决的问题。

三、本书在对旧史学反思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要素分析方法严格了历史学的规范，抬高了历史科学的门槛，开通了探索历史规律之路。以往我们在自然科学感召下口口声声说要发现历史规律，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不但一个规律也没有发现，甚至连什么是历史规律也未弄清，常金仓先生在《论现象史学》一文中从文化现象的确定、分解一直说到历史规律的主要特征，顺着这条

思路探索下去，在历史中发现规律的崇高理想的实现也许不会太远了。

四、常金仓先生关于 20 世纪古史研究的反思已涉及史学领域的好几个方面，从这些专题分析中使我们领悟到史学思维上的幼稚和肤浅，使我们意识到历史学的规范与真正科学还有很大距离。在他现已涉足的那些研究领域，他都重新梳理了各种历史因素的关系并赋予了这些研究新的意义，他在《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及其影响》中指出，研究早期国家的起源重点是它产生的途径或条件，因为那个途径和条件至今还深刻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他在《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山海经〉与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穆天子传〉的时代和文献性质》等文章中从根本上否定了自茅盾以来形成的进化论神话学，指出中国神话绝大多数创始于战国秦汉，它们是方士思想的一部分，而不是来自史前的记忆；中国学者进行了一个世纪的热烈的历史分期讨论，他认为那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而不是一个历史学问题，科学历史学应该拒斥这种讨论，他的《进化论人类学的终结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用人类学思想史上的事实论证了这一研究的暗淡前景。我在这里只想稍加提示，读者可以仔细阅读他的论证过程。

常金仓先生历经十余年的努力在历史学中开辟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还很陌生，然而我相信它将为刷新中国史学面貌做出重大贡献，我愿将这本书推荐给那些有理想和探索精神的人，庶使 21 世纪中国史学焕发出新的活力。

吕绍纲

2003 年 7 月于吉林大学

自序

1998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刊出了我的《穷变通久——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在这本只有25万字的小书中我阐明了关于中国史学如何发墨起废、走出困境的个人见解。据我的观察和了解，此书在思想活跃而成见不深的青年学者中曾引起某种程度的兴趣和关注，我陆续收到一些未曾谋面的读者来信，真诚地诉说了他们在读后产生的共鸣以及在学术思想上获得的启迪，从而以此书为中介建立起彼此之间的友谊。一本不敢自诩的小书在当今出版物如潮涌来到中国不至寂然无闻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但是改变一种长期形成的思想习惯却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人们通常是在痛悔前非之后才肯改弦更张的。

19世纪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维克多·库辛（Victor Cousin）有名言曰：“批判是科学的生命。”这句话被他的同时代人英国科学家兼哲学家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写在他《科学的规范》的扉页上，警示科学工作者。普通人习惯上把所谓“建设性”的研究结果看做知识的增长，而忽视“批判性”结果的重要意义，似乎它一钱不值，但是美国新进化论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曾强调指出：“在迄今为止较为短暂的历程之中，科学曾不止一次发觉自己行进在错误的道路之上。实际上，许许多多重要的科学成就，并非存在于某些新事实、新元素的发现之中，而是存在于竖着标有‘盲谷，请勿入内’的标志牌之中。”

在科学研究中，当人们遵循传统观念进行工作感到走投无路时，改变一下思路，就会发现先前被我们珍视的成果突然变得无足轻重了。对于实验科学来说，一个假设能否成立，哪怕需要经年累月的证实或证伪，真理与谬误总是能较快地被判定的；对于非实验科学，尤其像历史学，一个观点由于是权威人物最先提出的，即使已被事实质疑，仍然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这就是实验科学成长速度惊人而非实验科学出奇滞后的原因。对历史学来说，每走过一段路，回头来审视一下走过来的路方向是否正确，乃是学术进步的关键，这就是学术反思。反思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经常进行的，有两部为人熟知且极富反思意味的书，一个是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个是清人崔述的《考信录》，他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对前人学术思想中的非理性因素和伪历史进行了清理，成为后人经常翻阅的参考书。在历史上，各个时代都要产生一些新的文化因素，人们总要用这些新因素重新解说过去，这些解说有时使过去的历史更清楚，有时却损害了历史的真实，不断创造出来的新解释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方式相互联结，历史就难免被说得越来越奇，越来越怪，经常清理一下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可以遏制错误的蔓延，也有利于端正我们的思想和方法。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有影响的理论几乎都被历史学采纳过，我们绝不能认为多学科交叉研究必然导致积极的效果，因而在这种局面下研究出来的中国古史也亟待进行一番清理反思了。迄今为止我的反思使我意识到今日中国史学的某些基本观念、基本方法严重阻碍着它的发展。重新审视“书世述”野感而，斗微的形试始管果持交插

关于史学观念，本书希望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重新确立史学的使命。从20世纪学者撰写的较有意识的历史著作中可以概括出两种目的来，一些人认定从属和服务于政治是史学最大的价值之所在，尽管自19世纪以来学者深患政治史的独霸和狭隘让文化史与它平分秋色，公允点说，国家作为人类自进入文明时代以

来对社会影响最大最深的组织，历史学把它确定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千方百计为它出谋划策，皆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如何为它服务。古代史学是政治的附庸，自身并无独立性，因而历史的真伪是非都是由当前的政治需要决定的。在 20 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史学基本上还扮演着这种角色，如为推进政治民主而研究古代民本思想，为控制环境恶化而大谈天人合一，大体看来，这种借尸还魂式的服务既无助于政治，又歪曲历史。前述《科学的规范》指出，一切好科学的基本特征最重要的就是“有助于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增进社会的幸福，或加强社会的稳定性”。作为社会科学分支之一的历史学，要想替政治家分忧，为增进社会幸福和稳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首先就得像其他科学一样坚持本学科的独立性，从历史事实出发归纳出一系列社会发展的原理，帮助社会理顺各种关系。历史学虽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直接生产出物质财富，饥则可食，寒则可衣，但是如果有朝一日人类运用它提供的知识保障了人类的安全，解除了人类的痛苦，避免了物质财富因无知而造成的巨大浪费，那么它的贡献就绝不比自然科学小。现在回头来看历史学的现状，可以说它还是一门尚未找到用武之地的科学。

另一些人认为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复原”历史面貌，有时他们也说“复原”为的是进一步找出规律，不过直至今天那复原工作尚未做完，因而也无暇谈及规律。他们之中有大抱负者是以司马迁为楷模，写出一部厚厚的通史、断代史、专题史来，无此抱负者则以考证年代、人物、事件细节为己任，从而展现攻坚的能力。我以为历史上的人事只要湮没残损了就很难复原，企图复原历史的工作是一半靠不完整的记载，一半靠自己的主观猜测完成的，所以同一事物在不同人手里往往得到不同的结果。退一步说，这些结果即使再现了历史原貌，它又能满足现实生活的什么需要呢？在这样的观念下发展起讲故事的特殊爱好，因为我们的

故事中介入了大量研究者本人的观念，使专业历史研究与文学创作的界线变得模糊，在 20 世纪曾引起哲学家的质疑，他们问，历史学家所讲的究竟是事实还是虚构？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曾把文化进化论、传播论者复原历史的工作叫做“构拟历史”，他以为这样构拟出来的历史只能作“茶余酒后的雅谈”。讲故事的传统使人们忘记了科学是需要概括的，因而，历史学家最好把资料的整理和考究留给自己作专业训练的内容，以免转移了他的方向。

如果说历史学真正合理的使命就是用科学原理增进人类幸福，那么在研究方法上便不能不作相应的改变，由归纳概括取代叙述和考证。什么是科学的概括？另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说在历史构拟以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方法，我称其为‘归纳’研究，这种研究的目的和方法与自然科学和归纳科学基本相同。归纳法的前提认为：所有现象都受自然法则支配，运用某种逻辑方法来发现和证明某些普遍规律也当然是可能的，普遍规律就是指多少在一般意义上的一般性陈述或定则，每个陈述或定则适用于某个范围内的事实或事件。归纳的本质是形成通则，一个具体的事实被解释为一般法则的一个例证”。这种方法要求我们把观察的目光从孤立事件转移到普遍现象，把历时性叙述转移到共时性分析。我在自己的实践中把这种方法称为“文化要素分析”，因为我们发现任何一个文化现象都由若干因素构成，这些因素在历史上根据人们的需要频繁地分解和重组，其中呈现出明显的规律性。

科学归纳要求它的结果有相对的确定性，拒绝传统史学司空见惯的“一家之言”。卡尔·皮尔逊说：“事实的分类以及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形成的绝对判断——独立于个人心智的特性的判断——本质上概括了近代科学的范围和方法。科学人的首要目的在于他的判断中消除自我，提出对每一个心智与对他自己同样为

真的论据。”为了防止把学术民主变成随心所欲的自由谈，训练有素的、有道德的历史科学家在注意到与自己假设一致的事实时也应充分注意与自己假设相反的证据。

用这样的观点观察 20 世纪的历史研究时，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学科规范是多么脆弱，以致非科学结论随处可见。对于史学研究实践经验尚未丰富的人来说，读纯粹的理论著作感受不会深切，反之，对于理论修养不足的人来说，读一般历史著作缺乏是非敏感性，因而收在本集的论文大多从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入手，最后归结到理论和方法上，这样做不但容易通过实例理解抽象的道理，而且附带地使若干历史问题得到澄清。因为是反思，就不能不以举证的方式分析前人的研究案例，有时竟不能回避我一向崇敬的前辈师长，希望得到同仁们的理解和体谅。当然我的反思如果出现错误，朋友们自可做“反思的反思”，以期集思广益共同为 21 世纪历史科学开辟出一条新路来。

本书在出版全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曹宏举先生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他仔细审阅了全部书稿，在若干问题上提出了富有远见的建议，使原稿不完善乃至易于误解的地方有机会作及时的补充修正，特致诚挚的谢意。

常金仓

2003 年岁杪

目 录

吕绍纲先生序	(1)
自序	(1)
历史分期讨论与发现真理的两种方法	(1)
进化论人类学的终结与中国社会形态研究	(12)
论现象史学	(27)
从周公摄政的争论说到历史考证	(41)
五帝名号考辨	(58)
由鲧禹故事演变引出的启示	(78)
古史研究中的泛图腾论	(89)
古史研究中的生殖崇拜问题	(111)
中国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 历史的神话化	(131)
《山海经》与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	(148)
《穆天子传》的时代和文献性质	(170)
伏羲女娲神话的历史考察	(202)

重新认识殷周天命与民本思想的关系	(218)
邹衍“大九州说”考论	(231)
《老子》的教育思想与先秦文化传统	(246)
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形式及其影响	(258)
周书灿博士《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序	(271)
礼治时代的中国监察制度	(281)
周公制谥及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契合	(296)
周人同姓不婚为优生说辨	(304)
一项尚待检验的文化“工程”	(312)
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两个问题	(319)
张闻玉教授《铜器历日研究》序	(332)
晋侯苏编钟的月相年代问题	(337)
眉县青铜器和西周年代学研究的思路调整	(346)
(82)	
(85)	
(98)	
(111)	
(121)	
(124)	
(131)	
(135)	
(150)	

历史分期讨论与发现

真理的两种方法

20 世纪我国历史学上曾出现过两次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许多博学而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讨论并留下了大量的论著。一方面由于这次讨论没有获得人们预期的结果，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的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被人们冷淡了，有人讥笑历史分期的讨论犹如一列慢车，每个车站都要停下来改变一下行进的方向。近几年来，学者们对这桩事与愿违的争论进行反思，余兴未尽而态度乐观的学者埋怨现存史料太少，限制了讨论，因而寄望新史料的发现可以最终解决这个久悬不决的问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类问题上没有给我们留下确定不移的指示，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提法”^[1]，于是就有人着手从这些不同的提法中选择更具解释能力的分期理论模式^[2]；也有人说马、恩身后的理论家，如斯大林、司徒卢威，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期理论，或者是历史学家使用这些理论时出现了教条化和公式化的倾向。我以为这些见解皆不无道理，但最关键的是这场讨论混淆了发现真理的两种方法，即哲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

什么是哲学的方法？什么是科学的方法？二者的主要区别何在？这个问题早在 300 多年前已经由弗朗西斯·培根提出并讨论

过了，他描述二者的区别时说：

探求和发现真理，只有也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觉和具体的东西飞跃到最一般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原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觉和具体的东西中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的、无间断的上升，直到最终达到最一般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还未试行过……上述两条道路都是从感觉和具体的东西出发，都是止息于最一般性的东西，但二者之间却有着无限的不同。前者对于经验和具体的东西只是一瞥而过，而后者则是适当地和按序地关注于它们。还有，前者是开始时就一下子建立起某些抽象的、无用的、一般的东西，而后者则是逐渐循级上升到自然秩序中先在的而为人们知道得较明白的东西。^[3]

但是人类思想从浑浊不清的状态走到清晰可辨的状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不因某个先知先觉者的一席话语便可立即完成。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总是一不留心就混淆了二者的区别。现在我们应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属于什么性质的研究纲领。

恩格斯在 1895 年 3 月 12 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谈到他对封建主义的认识时说：

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像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封

封建主义是否曾经和它的概念相适应呢？它在西法兰克王国奠定了基础，在诺曼底为挪威侵略者进一步发展，在英格兰和南意大利为法国的诺曼人所完成，而它最接近于它的概念是在短命的耶路撒冷王国……难道说，因为这种制度只是在巴勒斯坦有过短暂的，十分典型的存在……它就是一种虚构吗？[4]

前苏联学者巴尔格在解释这种概括时说，这是一种以“纯粹形式”再现研究对象的方法，因为历史学家不可能用实验方式重现过去，而且始终由一堆非本质的东西掩盖着对象的本质，他们只能克服遮盖本质的层层堆积，在现实中找到那种被附带情况遮盖最少，最接近其抽象概念的典型社会形式。巴尔格同时指出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家随时都有可能碰上把外观当成“最终本质”的危险。[5]

这是一个典型的哲学概括，把各民族、各地区历史现象中相同的或类似的东西提取出来，当做是历史的本质，而把那些不同的东西当做是非本质加以扬弃，“封建主义”这一概念之得来如此，“亚细亚的”、“古代的”、“现代资产阶级的”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必须知道，用哲学方法概括抽象出来的都是一些形而上的，用来阐明历史发展趋向的概念，而不是可以实际操作的，用来界定历史现实进程的工具。所以历史分期理论中提到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或者“原生的社会形态”、“次生的社会形态”以及“原生社会形态在新的基础上的复归”，是一个概念体系，而不是一个年代序列上的时段。这就是说，在理论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整个人类历史看做是几个前后相继，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历史实际过程中，我们又无法根据这些概念的内涵准确地划分出任何一个阶段的年代来，因为概念和它的现实是两条永远不能相交的渐近线，它“使得概念并不